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了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象神龙一现似的竟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鸾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前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回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即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高,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育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

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末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未见过的元明杂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在实在可佩服！在这末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宏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牖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牖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捐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商带着书找上门的时候，即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意外的发现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也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末温热，那末兴奋，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

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为以为傻的傻事，但我决不甘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象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么的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末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末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足不出户，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的民族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起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取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一“狂驴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轨道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籍。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财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探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更广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颀（黄颀圃颀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料。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化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言神专家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顺到自己的癖好，

不旁鹜，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少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那一部不是国之瑰宝，那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的，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校抄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刀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揣摩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因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贖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焚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末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固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攀载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市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象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

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末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末窄小，实在有类于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末多，那末齐整，那末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余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绾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去，他们也几乎罗网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踏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象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那里去。我觉得：些这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非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象张菊生、张咏霓、柯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障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收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象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

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象这两批那末量多质精。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里走动，不时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的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以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末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末天真地高兴着，那末一股傻劲的在购求者，虽然忙的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求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沒有一句违言，甚至沒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目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大多，度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撮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残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方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尧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度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

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度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末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缴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尽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随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访问着；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灭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祈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全力的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却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慈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

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只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不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多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了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桌椅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哈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伪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踏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回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

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料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垫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末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关系；有的代为庋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激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的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的帮助，我也许便以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目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目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有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1940）正月初到三十年（1941）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略）

《外国图书馆学著作选读》征订启事

本书是国家教委1985—1990年教材规划中的一种。书中选录英、法、美、苏各国大百科全书条目，选录历代图书馆学者重要论著，勾勒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形成、发展，列有若干代表人物传略，后附近百年来各国图书馆学重要活动纪事。全书兼有理论及历史轮廓的作用，是图书情报专业师生及各级图书馆必备的参考书（由袁泳秋、李家乔主编译，吕叔湘先生作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发行，北京图书馆服务公司图书服务部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文津街7号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 帐号：6601—102